延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

汪洪清：长征过草地走了49天

[将军年谱]



汪洪清(1911—1990),今武汉市汉阳区人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1922年至1931年在湖北裕华纱厂当童工、工人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,加入中国工农红军。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红五军团第15军政治部青年干事、第13师第37团第3营连政治指导员、第37团政治委员、红九军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、红四军政治部敌军部部长、红四军第10师政治委员。1935年长征懋功会师后,相继任红四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、第10师政治委员、第10师政治部主任。

抗日战争时期,历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、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副主任、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卫第3团政治委员。1945年参加中共七大。

解放战争时期,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2纵队教导队政治委员、冀南军区独立第4旅副政治委员、桐柏军区汉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、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等职。参加解放安阳等战役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24师政治委员、河南商丘军分区司令员、信阳军分区司令员。1958年转业地方,任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副局长。



7月下旬,汪洪清将军之子汪中原讲述父亲的长征经历。

长江日报记者高文举 摄

扫码看视频

■长江日报记者赵萌萌
实习生柳林萍 陈丽阳

2026年7月下旬,武汉籍开国少将汪洪清之子汪中原在郑州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,身上穿的是一件15年前花45元买的上衣和一条穿了20年的裤子。

“能穿就穿,没必要浪费。”汪中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,回忆起了父亲的生活习惯。

一家人吃饭,米粒掉在桌上,汪洪清都会捡起来放进嘴里。菜吃完了,盘底剩点菜汤,他倒些白开水一兑,用筷子搅一搅,再端起来喝掉。

汪洪清11岁进纱厂当童工,20岁参加宁都起义投身红军,23岁随中央红军长征,从普通红军战士成长为政治干部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

1955年,河南省军区获授少将军衔的同志合影,左三为汪洪清。

纱厂“孩子王”成为红军战士

1911年,汪洪清出生在汉阳县鹦鹉洲瓜堤河街(今汉阳区鹦鹉洲一带)。1922年至1931年9月,他在武汉裕华纱厂当童工、工人。

年幼的汪洪清每天在机器间穿行,搬运、清扫,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。监工拿着棍棒在车间里来回巡视,工人稍有不慎就会遭一顿毒打。汪洪清后来形容那段日子:“头上泡泡垒泡泡,天天肚子吃不饱。”“泡泡”是指他挨打后头上鼓起的包。

汪洪清不是肯低头受气的人,在同龄孩子中很有号召力。纱厂里,谁被欺负刁难了,他都敢站出来鸣不平。

汪中原这样评价父亲:“他就是小孩头、孩子王。”那个年代,没什么好吃好玩的可以分给伙伴,能让人心甘情愿信服的,是“你受欺负了,我护着你”的义气。

长期身处备受欺压的社会最底层,汪洪清早早感受到普通劳动者的苦难,这影响着他的人生选择。汪中原说:“父亲是穷苦出身,对资本家和地主老财恨之入骨,打起仗来不怕死。”

1926年,15岁的汪洪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

1931年10月,他进入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,从事通信工作。2个月后的12月14日,26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,加入红军。起义部队随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。

党史资料记载:宁都起义后,红五军团建立政治委员制度、实行官兵平等,并开展系统政治教育,这支由旧军队起义而来的部队逐步被改造为新型人民军队。

军团长给他让马

1932年2月,汪洪清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后,他从普通战士、政治干事,一步步成长为红军政治干部。

这年春天,红五军团第15军从瑞金任田市出发,准备攻打赣州。当时,汪洪清在15军交通队当电话兵。

出发第一天,他就开始发烧。起初,他没声张,想着“走走路、出出汗就好了”。第二天,他病情加重,浑身发冷、打哆嗦。中午前后,他实在走不动了,便钻进路边一个破草棚,蜷缩着等后面的部队。

“同志,你是哪个单位的?怎么躺在这里?”

听见有人喊,汪洪清有气无力地说:“15军交通队的,病了。”

来人问清情况,立即让警卫员扶他上马。

直到这时,汪洪清才知道,眼前这个穿着灰粗布军装、脚穿草鞋,还背着一支步枪的人,竟是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。

这个身份,让他一下想起了此前在白军中的经历。有一次给旅长接电话稍微慢了一点,汪洪清挨了一顿臭骂。

眼前这位军团长让警卫员扶自己这个普通战士上马,自己背着枪步行。

汪洪清不敢骑。董振堂却执意坚持让马。一路上,董振堂背枪步行,还不时回头看看马上的汪洪清。休息时,他把水壶递给汪洪清;到了宿营地,又让警卫员给他弄面汤;天黑后,派担架把他送回15军交通队。

汪洪清后来专门写文章回忆这件事,他还记得军团长的话:“红军和白军不一样,白军军官压迫士兵,红军官兵平等,是阶级弟兄。”

很多年后,汪洪清成为政委、成为将军,待战士都极亲和。

突围后掉头冲向敌阵救战友

1933年11月至1934年3月,汪洪清在中央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级班学习。

1934年4月,江西广昌,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的惨烈战场。红五军团第13师37团在云际寨、大罗山一带阻击敌军。汪洪清当时在该团1营任营长,和营教导员袁文一同巡查阵地、安排防务。

4月21日,敌军第96师猛攻云际寨。1营连续击退两轮冲击后伤亡较大,接到撤至第3道防御地带的命令。汪洪清安排通信员通知袁文带领3连撤退,自己率1连、2连先行撤出。队伍后撤三四里地后,他始终没有看到3连的身影。

汪洪清当即判断袁文和3连陷入了敌军包围,对着身边官兵高声喊道:“3连还没有撤下来,走,我们拼死也要把他们救出来!”话音未落,他便端起一挺机枪,带头调转方向冲向敌阵。

汪中原后来听父亲讲过那天危急时刻的场景。战士们拼死相搏,硬是撕开敌人的包围圈,救下被围困的3连,又找来2名战士,拆下门板当担架,将袁文救了出来。

1934年10月,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。汪洪清随红五军团踏上长征征途。

红五军团承担的是全军后卫任务。湘江战役中,红五军团伤亡惨重;第34师在掩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几乎全军覆没。

汪洪清是从这样一支经历惨烈牺牲的部队中走出来的。“战友不能丢”,在云际寨如此;此后在更长、更艰苦的长征路上,这种朴素的战友情也始终伴随着他。

土匪一听他名字躲着走

长征中的汪洪清有一个重要身份——敌工干部。

1935年,他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。该军团承担战略掩护任务,四渡赤水期间伪装成红军主力在乌江北岸佯攻牵制敌人,单独行军作战近2个月,被称为“战略骑兵”。

汪洪清负责的敌军工作部主要工作是瓦解敌军、收集情报、开展统战。光有胆子不够,敌工干部还得脑子活、嘴巴灵、让人信得过,需要了解人、争取人。

汪中原说,父亲有着过人的语言天赋,“到了新地方,他很快就能学会当地的方言”。这让汪洪清在敌工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。

有一次,部队抓获了一个福建籍俘虏,一名来自福建的红军战士负责审讯。结束后,汪洪清问战士:“他说什么,你听懂了吗?”

战士摇头。

汪洪清当即翻译:“他说想回家,但是没有路条,也没有盘缠。”

福建方言复杂,省内不同片区之间往往难以互通。在场红军战士无不惊讶——一个湖北人,听懂了福建人都听不懂的福建话。

在汪中原的记忆里,父亲在湖北讲湖北话,到河南工作后说一口河南话,遇到湖南亲友能讲湖南话,陕西话也模仿得有模有样。

这背后,是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观察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。汪中原认为,长期与不同群体接触、处理复杂关系的经历,塑造了父亲沉着机敏的性格。

一次,汪洪清外出执行任务,需要借宿在当地老乡家中。老乡提醒他说:“今天晚上可能有土匪经过,你还是换个地方吧。”

汪洪清没有离开,回复道:“没事,我住这里。有异常可以和我说。”

深夜,一伙土匪果然来到附近。老乡告诉对方:“汪胡子在里面。”

听到这个名字后,对方没有进屋,往门内望了望,转身离开。

汪中原解释,父亲年轻时留着络腮胡子,当地人称他“汪胡子”。长期革命实践中,汪洪清与群众、地方人员建立了稳固联系,也形成了一定的个人威信。

从红九军团敌工干部,到后来继续担任红军部队政治工作领导职务,汪洪清始终把与人沟通、了解群众、掌握情况作为自己的工作方法。

“有文凭不一定有文化,有文化不一定有思想。”汪中原还提到,父亲这一代革命者,很多来自社会底层,他们经历过生活苦难,更能够理解普通百姓的处境,也是在革命队伍中不断学习、锻炼,逐渐形成坚定信念。

长征途中3次穿越雪山草地

汪洪清儿时没有受过系统教育,进入红军后,才真正开始学文化。

“行军走路的时候,前面战友的背包上写一个字,后面的人就跟着认一个字。”汪中原表示,当时行军就是课堂,战友的背包就是黑板,许多原本不识字的战士,在行军、学习和战斗中逐渐掌握文化知识。

几年下来,从纱厂走出的童工汪洪清已经能读书、看报,也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政治干部。

沿着汪洪清所在部队的番号变化,还能看出他的长征路线比一般人更曲折。

1935年1月前后,汪洪清进入红九军团政治部从事敌军工作。红九军团在遵义会议前后长期担任掩护、牵制任务,曾渡乌江,在遵义东北方向活动;1935年3月,主力南渡乌江后,红九军团一度被隔在乌江北岸,随后独立转战黔滇,经过老木孔一带,之后渡过金沙江。

1935年5月,红九军团掩护主力北渡金沙江;随后翻越夹金山。1935年6月,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(今小金)胜利会师。7月,红九军团改称红32军,编入左路军,继续随红四方面军行动。

中央红军部分部队首次穿越草地通常历时5至7天。会师后,由于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,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经历多次转战,3次穿越雪山草地。汪洪清也随部队经历了这段艰苦历程。

“我父亲走了49天草地。”汪中原说。

草地行军,纵横数百里水草地,泥沼被深草覆盖,人和牲口一旦陷落即被吞没。干粮吃光后吃野菜草根,有的人误食毒草丧命。他们白天在泥潭水草间跋涉,夜晚卧在湿漉漉的草地上。很多红军永远留在了荒原。

1936年10月9日,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抵达甘肃会宁,与红一方面军会师。这是继1935年懋功会师后的又一次大会师。当天进入会宁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中包括红4军和红31军。10月22日,红一、红二方面军又在将台堡会师,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。

从中央苏区出发,到贵州、云南、四川;从红五军团到红九军团,再到红四方面军;翻雪山、过草地,又在分合与曲折中北上……

汪洪清很少向子女讲长征艰难,但和老战友聊天时常感慨:“大批红军牺牲在路上,连姓名和遗骨都没留下。”

汪中原说,父亲一生坚持原则。当年自己参加海军航空兵飞行员选拔,最后一关被刷下来了。当时地方的许多武装部长都是父亲的老部下,但他坚决不走关系不打招呼。父亲曾说:“你爹是你爹,你是你。国家给的荣誉和孩子无关。”

[故事]

红军本色 保持一生

1936年,长征胜利结束。

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,汪洪清继续从事统战、政治工作,工作能力来自长征时期敌工工作的积累。在部队管理上,他延续红军时期形成的作风,清晨带头出操训练,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,被官兵们称为“我们的实干政委”。

长征途中淬炼出的“红军本色”,他保持了一生。

比如粮食。

汪中原认为,父亲珍惜粮食,既与童工时代挨过饿有关,更与长征时期尤其雪山草地上的饥饿经历分不开。那些年,“吃不饱”意味着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,再也没能起来。

所以后来条件好了,掉在桌面上的一粒米,他还是要捡。

再比如鞋。

正式场合汪洪清按规定穿皮鞋,内心深处却更爱千层底布鞋。部队里配发皮鞋,他穿不惯,就送给警卫班的战士。

“他对战士们特别亲,没有一点架子。”汪中原说。

1955年授衔后,汪洪清收到将军服礼盒,打开一看,白衬衣领子发黑,白手套也沾了点灰。原来是警卫班战士听说有将军服,好奇地轮流试穿。汪洪清没生气。在汪中原看来,这正说明父亲和战士之间没有心理距离。

一次乘火车,按规定,汪洪清作为少将可以乘坐软卧,警卫员只能在车厢外休息。但车程漫长,他不忍心看年轻战士坐在凳子上熬,于是将其喊进包间休息。

这一幕,很容易让人想起他刚参加红军时感受到的“官兵平等”。也让人想起1934年云际寨那个已经撤出几里地,发现战友没回来又带人冲回去的年轻干部。几十年过去,身份变了,汪洪清待人的温度和尺度没有变。

汪中原认为,父亲将从长征磨砺出的群众观和奋斗精神融入了一生,“从没要求孩子非得穿差些,不会刻意把清苦当成家规,而是将一切沉淀为个人的生活选择,影响着后代。”

如今,汪中原自己也像父亲这样。15年前的上衣还在穿,20年前的裤子也没有扔。他说:“衣服不烂不破就能穿,不是买不起,就是觉得没必要浪费。”

替早逝的哥哥养了半辈子家

由于年轻时便离家参加革命,汪洪清与武汉的家人曾长期失联。几十年的革命岁月里,他辗转各地,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,孝敬父母和家中事务则由哥哥承担起来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汪洪清重新与家人取得联系。后来哥哥早逝,留下了需要照顾的子女。得知情况后,汪洪清主动承担起责任,接替哥哥照顾遗孀和孩子。

汪中原回忆,此后几十年,汪洪清每个月都记着时间,到邮局填写汇款单,寄钱接济侄子侄女。如果有事耽搁,下个月也会尽快补上。

后来,汪洪清常回武汉,一方面是给母亲上坟,另一方面也要看看嫂子一家。

汪中原说,父亲老家的侄子成年后,每隔一两年都会到郑州看望汪洪清。

(长江日报记者赵萌萌)